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工业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1958 — 1965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工 业 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工业卷/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编.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 5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ISBN 978 - 7 - 5095 - 1825 - 0

I. 1… II. ①中…②中… III. ①经济 - 档案资料 - 中国 - 1958—1965②工业 - 档案资料 - 中国 - 1958—1965 IV. F129.72 F4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5167 号

责任编辑: 梁 涛

责任校对: 张 凡

封面设计: 陈 瑶

版式设计: 兰 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mailto: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发行处电话: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北京富生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48.5 印张 1 214 600 字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230.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1825 - 0/F · 1527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44

**本课题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

##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房维中			
主 编	刘国光	王洛林	毛福民	杨冬权
副主编	董志凯 (常务)		武 力	徐建青
	段东升	李明华	李和平	杨继波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洛林	王晓峰	石建国	史纪辛
	刘国光	刘美玲	刘贵贞	许 虹
	许卿卿	曲 韵	陈廷煊	李小宁
	李应和	李和平	李明华	武 力
	杨冬权	杨继波	段东升	赵月琴
	赵学军	贺德海	郝和国	姜长青
	徐建青	程连升	董志凯	

# 总序

刘国光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磨砺和积累，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 21 世纪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 21 世纪初叶，面临全球化、现代化潮流中的竞争和挑战，我们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综合国力和全民族素质，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需要实施科学发展观，深化改革。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抚今追昔，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合作编辑的大型经济学术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正是来自这一宗旨。

《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所涉及的八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阶段。从 1958 年开始，党和国家的工作进入了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每年在建大中型工程项目由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百位数上升到千位数，还有数以万计的小型项目。在这一阶段史无前例的探索历程中，我国出现了严重的失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又在迅速走出困境的同时创造了一系列有效的管理经验，其中一些经验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先河。全面、客观地了解和认识这一历史时期经济建设的丰富内容，对于国史、党史、经济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 1958 年开始到 1960 年底基本结束的三年“大跃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试图摆脱苏联高度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行政性计划管理体制，试图通过群众运动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探索。但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由于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不顾成本的大干快上，“大跃进”期间，一方面建成了一批重要工业项目，改善了工业布局，农村工业第一次有了迅猛发展；同时带来严重的比例失调和经济波动，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农业的严重减产和饥荒。

经过“大跃进”的教训，我们对于以农业为基础、从全局出发处理各方面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刻了。为了摆脱困境，1960 年底，党和国家对调整国民经济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 1961 年开始，我国经济体

制和经济运行进入了长达五年的调整时期。其中，1961—1962年为初步调整阶段，主要是纠正“大跃进”时期的体制偏差，强调经济管理的大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委三级。基本建设投资不再由地方财政包干，改为中央财政专项拨款，严加控制并减少部门、地方、企业的预算外资金。在农村，将原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改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些地方实行了“包产到户”。同时，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调整农、轻、重关系，加强对农业的支持，精简“大跃进”期间迅速膨胀的国营企业职工和城市人口，关、停、并、转效益差的企业等。从1961年下半年起，为活跃商品流通采取了多种措施，在三类物资（包括工业品、手工业品、农副产品）管理方面有所放松，集市贸易有所恢复，对推动城乡物资交流、活跃经济起到积极作用。在工商企业，通过颁行《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等办法，重新建立起规章制度和秩序。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取得了明显效果。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以及工业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得到调整。国家财政实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略有回升。

经过三年调整，渡过了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再用三年时间，继续实行“八字方针”，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到了1965年，原定的各项调整任务顺利完成，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这时受国际战争环境紧张的影响，我国形成了国防第一、全国支援三线建设的新局面。

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训，我国经济体制开始形成不同的发展思路：一种思路认为农业经济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国有企业可以采用更多的经济手段来代替行政手段，例如试办托拉斯、推行经济核算、强调利润指标和恢复奖金制度；希望发挥市场调节的拾遗补缺作用，以弥补计划经济的缺陷。这种思路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了先河。另一种思路从维护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出发，联系中苏两党的思想和政策分歧，批评上述探索为修正主义。由于两种思路是在反复探索 and 实践中形成的，其中穿插着大量的调查研究、典型试验，以及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干部思想革命化”、农村“四清”、城市“五反”等各种政治运动。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后一种思路在当时占了上风，为此后的“文革”作了铺垫。

抚今追昔，这些探索具有丰富的内涵可供研究。通过阅读这批档案资料选编的内容，可以体会到我国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对于这些探索与尝试中的经验教训多一些了解，不仅有助于认识历史，而且对于现实与未来必将有所启迪。

《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是《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和《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的续编。与以往两批资料相比，第三套档案资料涉及的时限更长，内容更加丰富，数量也更多。全套丛书共计10卷，约1500万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通力协作，科研人员与档案管理人员合作，查阅了卷以千计、字以亿计的档案资料，含辛茹苦，历时六载才编辑而成的。这套丛书的出版，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经济背景、经济

体制变革以及经济运行提供了丰富详尽的学术资料。以往两套资料的出版，已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推动产生了一批有创新见解的国史、党史和经济史的科研成果。本套资料的面世，必将有助于更多富于创见的新成果问世。

在性质与体例上，这套丛书与前两套一样，仍是一部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料的大型学术资料系列丛书，兼有资料性和学术性双重意义。一方面，书中正文内容全部采用原始的档案资料，在编辑过程中严格维护文献原意，对重要文献资料力求兼容并蓄，在有限的篇幅中，为读者进一步深入探索提供详尽准确的来源和出处。另一方面，编者对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分析，按照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发展、经济体制演变、产业结构变迁、经济运行各个环节等方面分门别类设卷，编排成书；纲目设置原则为历史顺序和经济理论逻辑与经济运行规律相结合，每一卷资料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使读者一目了然，便于比较分析和研究，而不同于一般的文件汇编。它兼有资料性、学术性和科学性。可以说，这套丛书也是一种形式的经济史书，这项工作更是一件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的工作。

这套丛书的编辑和出版，得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国家档案局、国家各部委档案部门的热忱支持，并承蒙当年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老同志的谆谆指教，在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谢意。

由于这是一件开拓性的工作，加之档案资料的分散和统计资料的不完备，编辑工作必然有诸多不足和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读者提出批评建议，以待再版和续编时改进。

2009年12月



# 凡例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是一部大型经济学术资料系列丛书，也是一部工具书。编辑的目的是为经济决策部门、经济工作者和从事经济研究、历史研究以及教学等方面的人员提供比较系统全面的经济档案资料。

二、本丛书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顺序编排。继第一批（1949—1952年）、第二批（1953—1957年）档案资料编辑出版之后，第三批为1958—1965年的档案资料。全书力求全面系统地收集选录1958—1965年我国经济工作中有关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发展、经济管理体制演变以及生产、流通、分配、再生产等经济运行诸环节的主要档案资料，反映该时期我国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

三、全书按专题立卷，包括综合、工业、农业、商业、财政、金融、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交通邮电、外贸共10卷。部分卷的内容间或交叉，但从各卷的特点出发，各有侧重。

四、每一批丛书有“总序”，反映该批档案资料编辑的宗旨、目的、意义及其共同点。各卷写有“前言”，概述该卷的基本内容；书后附部分资料索引。

五、各卷的结构大体一致，一般采用纲、目、子目三个层次，按“第X部分”、“一、二、三”、“（一）、（二）、（三）”排列，部分纲目设立分子目，按“1、2、3”排列。

六、由于按专题立卷设纲目，并确保材料精练，增加信息容量，对档案资料分别采用全录、节录、摘录方式处理。凡采用全部或大部分内容者，题目在文前，出处在文后，发文方文后不再重列；凡采用小部分内容节录、摘录者，题目、出处在文后。为便于读者了解档案资料原貌，尽可能整段选编，并对删节之处注明[上略]、[中略]、[下略]。对部分人名、事件资料及已变更的地名，在页下加以简要注释，按页编序号。在每个子目之中，资料一般按时间顺序排列，并照顾事件、逻辑相关联者放在一起，以便查阅。

七、凡属编者加在行文中间的文字，均加[]号；凡为遗误字，在该字后面加[?]号；残缺或模糊难辨的字，用□号表示。

八、各种资料标题下的日期以及资料出处的日期一律使用公元，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资料中的年代日期和数字，一仍其旧。

九、资料出处置于该件资料之后。为节省文字起见，部分国家机构采用简称（如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建设委员会分别简称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中央批转文件的收文方部分省略。部分档案资料出处以数码代之。数字为建立档案资料的部门、单位或资料书的分类编号，括号内为资料书的年号、卷次等。书后附录中有代码索引。

十、各卷附相关“要事年表”。

# 前言

石建国

如果说建国头7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社会关系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1958—1965年则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就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探索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进行的一场史无前例的试验和摸索时期。通过“一五”计划的实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进行，我国在短短几年内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盼望已久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当时的中国作为一个初具计划经济形态的农业大国，如何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快速转变，实现强国富民的梦想，已经提上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议事日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大胆进行尝试，希望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通过超常规的发展路径，来实现“超英赶美”发展战略，从而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创出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历史时期的开端——“大跃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 一、1958—1965年工业发展的背景

“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发动与“超英赶美”战略的提出有着很密切的关系。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即席讲话中提出，在钢铁方面，15年后中国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诺言能否兑现，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声誉。毛泽东回国后开始从各方面着手，为加速工业的发展积极作好准备。1958年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后，中央从宣传、组织、计划等各方面开始为“大跃进”酝酿和造势。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特别是“以钢为纲”工业的畸形发展，导致国民经济开始出现不和谐的失衡局面，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试图在高举“三面红旗”的条件下，对已经失衡并出现紊乱迹象的国民经济作出调整，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意见，但随后很快发生了批判“反右倾”运动。为了响应“反右倾”，各地的“大跃进”运动以更为猛烈的劲头再次升温。纠“左”的努力也自然被打断。

1960年11月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八届九中全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提出，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逐渐进入全面调整时

期，包括宏观方面的调整，也包括微观方面的调整，在工业方面亦是如此。一方面是以农业为基础安排国民经济，以工业支援农业；另一方面就是重新调整工业管理体制，加强集中管理，同时加强企业的日常管理，恢复和建立各种规章制度。

1963年9月5日，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决定暂缓第三个五年计划，把1963年到1965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渡阶段；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在经济计划的安排上，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破尖端的次序。

三年调整时期，工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中央对国防工业的加强和对工业布局问题的重视。“大跃进”运动末期，国际和国内形势紧张局面日益加剧。一方面，台湾国民党当局欲反攻大陆，不时侵扰东南沿海地区；另一方面，中国周边关系趋于恶化，中苏论战，中印交恶，战争的阴霾仿佛正在临近。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提出建设三线的意见。到1964年下半年，这种意见开始在实践中逐步部署和落实。

进入6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在经济调整过程中，许多好的工业建设思想被陆续提出，并在实践中加以试验，例如托拉斯的筹办以及专业化的生产等等。但是在“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这些好的设想和做法都没有能够继续深入发展下去，已经着手进行的改革措施也被迫中断。

## 二、工业计划与工业运行的绩效

“二五”计划中，尤其是工业计划的制定与执行，是一个充满艰辛而又多变的历程，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二五”计划文件正式公布于世。本来“二五”计划制定着手很早，国家计委经过多方面的准备，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通过了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但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导致“二五”计划的指导方针也相应发生巨大的变动。在当时的技术条件和认识水平下，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由于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工。

不仅总的计划如此，年度计划也是如此。几乎每年都是由主管机构先制定出下一个年度计划的总体框架，然后再不断地修改、补充新的指标，其结果往往是年度计划正式公布以后，也会在后来的实践中不断地变动。所以，本卷所收录的“二五”计划和年度计划中工业方面的内容，只是一个大致的框架。

1958—1965年共计8年左右的时间。在这8年时间里，主要工业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特别是从1965年起，中国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工业产品的种类和品种不断增加，电子工业、原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得以建立。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建成投产的。1949—1964年，许多重工业部门新建设的大中型项目中，2/3以上是这个时期新开工的。1950—1979年30年中新增的工业生产能力和设备容量，如炼钢、炼铁、采煤、发电设备装机容量、机制纸、棉纺锭等主要工业，这个时期新增工业生产能力和设备容量都约占1/4~1/3。<sup>①</sup>

但凡事物都有自己的两面性，8年时间的工业建设同样也存在着巨大的失误。比如说在

<sup>①</sup> 柳随年、吴群敢主编：《“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1958—1965）》，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页。

“大跃进”时期，片面追求高速度，不讲求经济效益；以钢为纲，其他产业和其他工业都要为钢铁让路，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在大炼钢铁的情况下，煤、电、运十分紧张。对此，《人民日报》指出：“出路在哪里呢？三十六计，还是走‘小、土、群’的道路是上上计。”“煤炭工业部最近提出了‘兵对兵、将对将，用分散的小煤窑对分散的土高炉’，‘哪里生产千吨铁，哪里就搞万吨煤’的口号，这应当作为所有地区的行动口号。”<sup>①</sup>虽然小高炉、小煤窑解了燃眉之急，但同时造成了产品质量下降、生产事故频发的后果。

### 三、工业企业体制、制度与工业运行

#### （一）工业体制的演变

在这段历史时期，全国范围内的工业经历了从中央集中到地方分权，再到中央集中的一个曲折过程。

早在“一五”计划实施后期，中共中央就已经察觉到中央集中过多、地方权力太小的矛盾。在毛泽东同有关部委负责人谈话后，根据了解到的情况，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就有涉及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方面。毛泽东认为：“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sup>②</sup>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其内容之一就是放权。中央采取的工业企业管理上放权让利等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工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当时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就总体来说，中央此时放权措施的动作幅度还不是很大。

在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战略以后，他认为单靠中央部委的努力难以实现既定的目标，要想实现工农生产大的跃进，就必须充分发动地方的积极性。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工业产值，在5~10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后来又要求在7年、争取5年内实现这一目标。为了保障设想能够顺利实现，当时中央规定生产计划实行两本账制度。中央的两本账当中，第一本是必成的；第二本是期成的。在地方的两本账当中，第一本是与中央期成的账一样，也就是说，中央的第二本账是地方的第一本账，对地方来讲是必须完成的。地方的第二本账，是地方期成的。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酝酿与发动，生产计划与指标已不再仅仅具有单纯经济学含义了，而且还是一种政治觉悟和政治态度的体现。出于当时的压力和不同的原因、目的，各地的跃进计划指标越定越高。

中央为推动“大跃进”运动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在1958年6月份，中央要求在较短的一个时期内，完成中央所属有关企业、事业单位的下放。当时，在中央所属的1165个企业事业单位的总数中，有885个下放给地方，约占总数的76%。<sup>③</sup>

<sup>①</sup> 《全民大办小煤窑》，《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sup>②</sup>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0~91页。

<sup>③</sup> 具体可参见本卷收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1958年4月11日，中央档案馆馆藏：Z44-1958（1）；《中共中央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1958年6月2日，中央档案馆馆藏：Z44-1958（1）。

此外，中央还发动地方大办工业。在大办地方工业的过程中，由于资金、物资的缺口很大，国家无力对大型工业企业以外的项目进行投资；但中国也有一个潜在的优势，那就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集中有力的动员机制。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使得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来搞工业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正如当时《人民日报》所说：“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搞特搞群众运动，是我们一切建设事业高速度发展的基础，是我们党领导各项工作的根本路线。”<sup>①</sup>“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规模壮阔的群众运动，只靠少数人‘埋头苦干’，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卫星’，生产发展的速度也就不会这么快。”<sup>②</sup>由于大办工业，造成人员、物资的紧张局面。特别是大炼钢铁后，抽调农村劳动力炼钢炼铁，影响了农业生产。企业管理权限下放以后，各地的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猛增，出现了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

1959年6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谈话中提出要逐步收回过去下放过多的“四权”（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但由于随后发生的“反右倾”运动打乱了原有的部署，直到1960年后，才开始大规模地上收“四权”，原来“大跃进”时期下放的企业又重新由中央加以管理。

在调整时期，中央在工业管理体制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制定和颁布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七十条），在工业企业专业化和协作化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以后的工业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二）企业管理制度的有关情况

“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有许多好的经验需要总结，也有许多教训需要吸取。但是，“大跃进”运动的迅猛开展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管理。随着工业企业管理体制的变动，企业的日常管理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发动群众运动，大破原有的规章制度。“在这几年间，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城市许多工业企业废除的规章制度约占60%~80%，其中，有许多是行之有效或者是基本合理的。瞎指挥、乱操作的结果，使事故大量增加，设备损坏严重。”<sup>③</sup>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严格的科学的管理制度被当作群众运动的绊脚石加以打破，从原料选取到成品出厂的整个生产制度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特别是在“大跃进”时期，出现了大量纪律松懈、管理废弛的现象，质量不合格产品所占比重迅速增加，安全事故频发，造成大量人员和物资方面的损失。

各种管理问题的暴露，以及由此导致的巨大损失，逐步引起了中央决策层的注意和重视。在“二五”计划后期，各种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陆续得到恢复与建立，与此同时，一些新的管理制度也开始在企业里试行和确立。

随着中共领导高层对于阶级斗争的重视，工业企业这方面的相关工作也不断得到加强。企业在恢复相关规章制度的同时，其政治工作也日益得到重视。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学习解放军的指示，各工业企业不仅从组织机构方面设立了政治部、处等，并且从日常学习、生产、生活等许多方面都强化了这方面的内容。

## （三）企业日常运行的有关情况

① 《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人民日报》，1958年9月24日。

② 《“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日。

③ 可参见本卷收录：国家统计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工业发展的主要情况》，1963年9月21日，中央档案馆馆藏：157-3-188。

大跃进时期工业生产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拼设备、拼消耗。为了完成高指标，许多厂矿企业的设备带病运转，设备的维护与维修跟不上，造成了机器设备的很大损耗。

由于强调各地的积极性，企业管理权限全面下放，特别是中央希望七个协作区都能够建成独立的工业体系，这些综合因素所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使得原有的协作关系受到冲击，甚至中断。各个大协作区之间、省际之间、县际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重复建设。这两种情况的并存和发展，对工业生产带来不利的影响，以至于出现“恨铁不成钢、恨钢不成材、恨材不成器、恨器不成套”的局面。

“大跃进”运动中，“多快好省”的中心是快，盲目求快成为主导工业工作的主要指针。快则难优，特别是各个地区的“小土群”、“小洋群”生产的许多产品质量低劣，难以达到最低的质量要求。在“大跃进”的局面下，当时多数工业企业的负责人最为关心的是计划的完成情况，而计划的完成主要以产品的数量来衡量，所以，在数量和质量矛盾的情况下，追求数量自然成为企业的首要选择。

同时，“大跃进”运动中，工业企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往往不能与社会效益成正比。一方面是产品质量不合格，浪费了有限的资金和宝贵的资源；另一方面，生产造成的破坏后果很严重，这种负面影响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尤其当时的大炼钢铁和小土群、小洋群运动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 四、1958—1965年工业发展中的几个关系

##### （一）农轻重之间的关系

在1958—1965年这段时期，农业和工业的比例关系起伏很大。经过连续3年的“大跃进”，农业产值比重下滑，工业产值比重大幅上升。在国民收入净产值中，工业的比重由1957年的37%提高到1960年的64%，农业的比重由63%下降到36%。<sup>①</sup>后来经过近5年时间的调整，特别是工业大力支援农业以后，农业不断得到恢复和发展，所占比例也不断回升。到1965年，在工农业净产值中，农业的比重由1960年最低时的34%上升到50%，重工业则由最高的46%下降到30%。<sup>②</sup>这一时期轻工业的发展与农业的发展轨迹相类似。以辽宁省为例，1957年，轻重工业为21.7%和78.3%，到1960年则变成17.6%和82.4%。<sup>③</sup>从全国范围内来看，1957年的工农业净产值中，农轻重的比例分别为62.3%、18.2%、19.5%，1960年为34.1%、19.7%和46.2%，到了1964年则变为50.1%、20.3%和29.6%。这说明，到调整后期，农轻重的比例趋于合理。

##### （二）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的关系

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计划时，国家计委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就是按照“军民结合、和战结合”的方针，来考虑工业生产在战时和平时的互相转化问题，机械工业计划的安排尤其如此。例如，国家计委要求在某些重要的企业里建立军工生产车间；尽量

<sup>①</sup> 国家统计局：《最近三年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问题的报告》，1961年8月20日，中央档案馆馆藏：157-2-98。

<sup>②</sup> 国家统计局：《我国农轻重比例关系的现状》，1965年3月16日。中央档案馆馆藏：157-3-214。

<sup>③</sup> 北戴河计划会议简报（第9期）东北小组（第1号）：辽宁省计委副主任林浩同志发言要点，1961年7月20日，中央档案馆馆藏：150-9-69。

利用民用工业的转产能力来满足战时需要等等。1960年以后,国民经济出现困难局面,中央军委在征得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的同意后,开始筹办工业企业,以解决工业产品和物资匮乏问题。1961年4月,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国防工业部门1961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的报告》,要求各地重视国防工业的生产,国防工业较多的地区还应成立负责此事的专门机构。随着国民经济调整后期对于战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对于军事工业的生产也重视起来。为此,1963年8月通过《民用工业为战时动员在平时做好准备的工作条例(草案)》。1965年,国家经委还召开了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之间的技术交流问题的座谈会。

### (三) 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的关系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过程中,地方上要求多搞一些工业。国家计委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方针和发展预想。“大跃进”运动发动以后,特别是为了尽快实现钢铁产量的迅猛增长,中央开始鼓励并支持地方发展工业,因此,如小煤矿、小电站等小型企业得到迅速发展。通过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实现全民大办工业的运动,中央希望以此开拓出一条“中央办大工业,省办省工业,专区办专区的工业,县办县的工业,乡办乡的工业”的道路。<sup>①</sup>

据统计,到1959年底,全国共有“小土群”和“小洋群”工业企业31.4万个,占当年全部工业企业31.8万个的99%，“小土群”和“小洋群”工业共有职工2 082万人,占当年全部工业职工(包括工业企业、城市手工业、人民公社工业的职工)3 009万人的69%；“小土群”和“小洋群”工业全年总产值达1 018亿元,占当年全部工业总产值1 693亿元的60%。<sup>②</sup>

1960年国民经济困难局面出现后,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开始有计划地收缩重工业生产战线,放慢工业发展速度。同时,重点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将过去下放给地方的工业企业开始逐步收回,上收工业企业的管理权限,强调集中管理,重新确立了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的关系。

### (四) 关于工业布局的问题

按照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原来的设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东北地区不是建设的重点地区。上海等地除扩建几项工业以外,同东北、华北地区一样,都要大力支援其他地区,以便在第二个五年内,各大协作区都能够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sup>③</sup>“大跃进”的发动冲击和打乱了原来的计划和部署。1964年以后,按照中央的调整,工业重点建设三线地区。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见本丛书的《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

## 五、本卷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本卷按照三个方面来编排:第一方面包括工业发展的背景、计划的制定、实施等部分

<sup>①</sup> 具体可参见本卷收录:《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1958年3月21日成都会议通过,4月5日政治局会议批准,中央档案馆馆藏:Z44-1958(1)。

<sup>②</sup> 国家统计局:《关于全国工业交通“小土群”和“小洋群”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1960年5月17日,中央档案馆馆藏:157-3-110。

<sup>③</sup> 国家计委党组、国家经委党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向中央政治局的汇报提纲》,1958年7月28日,中央档案馆馆藏:150-6-121。



内容；第二方面是企业管理体制、企业制度以及企业运行方面的内容；第三方面则是工业同农业的关系以及工业内部的有关情况、工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和工业统计资料的有关内容。

上述内容具体细化为八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工业建设与管理的指导思想和方针的变迁，为本卷选编的材料勾画出一个大致的历史背景。这部分内容较少。第二部分是计划的制定与调整。第三部分是工业生产发展的情况以及当时工业发展水平与国外的比较，收录了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工业援助的有关材料，还涉及中国从西欧等发达国家进口设备和技术的有关情况。第四部分是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内容，包括关于管理体制的探索、工业隶属关系的演变和工业管理实践等方面。第五部分是工业企业微观层次的考察，具体涵盖了工业发展当中施行的具体制度，以及工业企业日常运行情况的有关分析、工业企业的个案分析。第六部分是部门工业的发展情况，这部分内容较多。第七部分是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与农业的关系，以及工业发展中内部的各种矛盾情况。第八部分是工业发展当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和相关的统计资料。

由于本卷篇幅所限，对于有些篇幅较长、业已公开的重要档案资料，编者只标出了文件的名称、时间、单位及此文件的出处，以便于研究者利用和查询。

本卷同《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其他卷本一样，不是简单的档案汇集，而是具有一定理论框架和学术色彩的经济史方面的参考文献。由于本卷的时间跨度很大，涉及的内容更是纷繁复杂；不仅档案资料的分布在时间上很不均匀，而且在各个行业之间也有很大差别。本卷尽可能收录了所能涉及的方面，但由于档案资料方面的客观限制，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又史料详尽。

在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国防工业在这8年当中是工业发展的一个重点，但收入本卷的档案资料很少，而且主要是从民用工业与国防工业之间关系的角度出发来收录的。

在档案资料的选用上，编者尽量保持原有档案资料的完整性。特别像一些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转发的文件，在本卷中尽可能全文收录。另外，本卷也试图展现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之间的互动过程，例如国家有关政策是如何下达的，企业是如何贯彻的；企业情况是如何向上级管理部门反映的，上级又是如何回应的、采取了怎样的措施等等。

本卷在编辑过程中，始终得到了中央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领导和工作人员的热情支持。王秀华、殷月兰、李小雪、乔咏梅诸同志在档案资料的提供、审批和复印等方面付出了艰苦劳动，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分卷主编石建国，编辑杨宇新。